

「香港人」或「中國人」： 香港華人的身分認同 1985–1995

• 劉兆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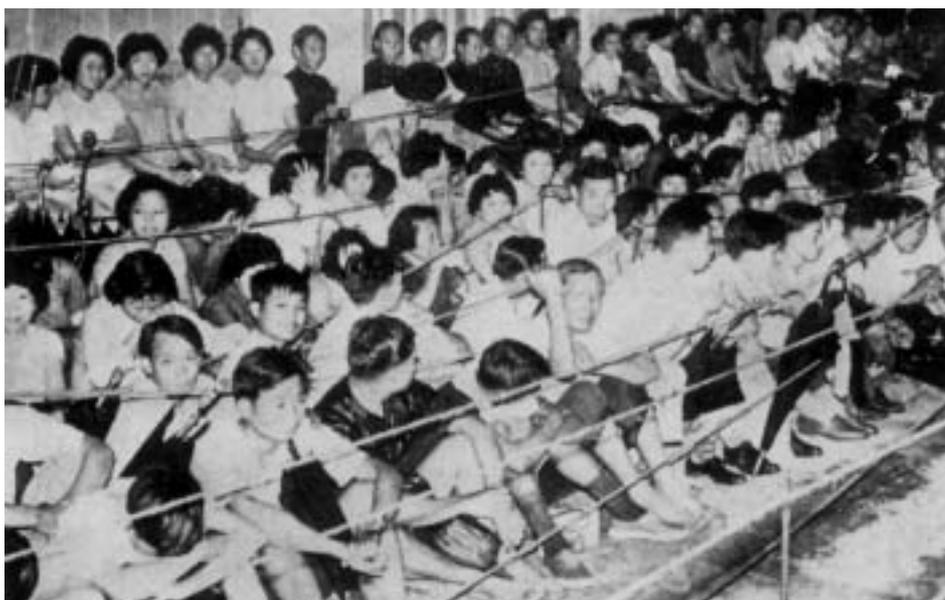
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成立、「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保持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及生活方式不變」與「高度自治」等方針政策的實施，在在都表示，從1997年開始，在中國廣大的社會主義體系中間，將會存在着一小片擁有高度自治權力的資本主義飛地(enclave)。由於香港被英國殖民統治達一個半世紀之久，而其制度與文化又與大陸迥異，要把香港重新納入中國母體之中，其難度之高自然不言而喻。

其中一個困難，厥為香港華人的身分認同問題。當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時，原先英國在香港與內地之間所起的屏障作用便告消失，從而身分認同的問題對兩地之間的關係便有嚴重的影響。作為一個概念而言，「身分認同」是模糊的和多層面的。本文的主旨，在於一方面探討未來香港與內地的關係，另一方面則分析香港內部的政治，所以文中援用的「身分認同」一詞，主要指香港華人對他們與香港及中國的關係的理解與界定。很久以前，香港華人普遍使用「香港人」及「中國人」兩個詞來指謂自己，我們因此可以肯定地認為：「香港人」及「中國人」乃是香港華人感到最有意義的兩種身分。(為了敘述方便，我把認同自己為「香港人」的人簡稱為「香港人」，而認同自己為「中國人」的人簡稱為「中國人」。) 以此之故，在本研究中，我們以這兩種香港華人的身分認同作為起步點，並藉此為一系列問題尋找答案：(一) 在邁向1997年的過程中，香港華人是否面對一個「身分認同危機」的問題？(二) 這兩種身分認同是否各自與一些態度上及行為上的特徵相連繫？(三) 身分認同問題如何在1997年後影響內地與香港之間的關係？它對「一國兩制」政策的落實有何影響？(四) 身分認同的問題將如何影響1997年後香港的社會與政治？「香港人」與「中國人」的身分的分野會否造成這兩類人在政治態度上的分歧？(五) 將來這兩種身分認同會否愈趨模糊，或者甚至消融在一起，從而使身分認同問題在政治上變得沒有意義？

自從1985年以來，我和其他學者曾經進行了一連串的問卷調查，當中有部分問題涉及香港華人的身分認同問題^①。下面的論述，是基於我們對調查數據進

在邁向1997年的過程中，香港華人是否面對一個「身分認同危機」的問題？身分認同問題如何在1997年後影響內地與香港之間的關係？「香港人」與「中國人」的身分的分野會否造成這兩類人在政治態度上的分歧？

60年代，當來自中國的移民放棄了返回社會主義祖國的念頭，而他們的後代又難以在香港以外找到家國之後，香港才開始建立一個穩定的華人社會。



行統計分析後所得到的發現。在整篇文章中，用以量度變項之間的聯繫程度的方法為卡方 (chi square) 分析，統計上的顯著度則定為0.05。

香港人與中國人

由於絕大部分香港居民在血統上為華人，香港因此可稱為華人社會。香港雖然在一個半世紀以來是一個英屬殖民地，但在其大部分的歷史中，香港的華人口卻並非定居在香港，及以香港為家的。相反，隨着中國國內及海外情況的轉變，香港經歷了多次的華人湧入及湧出的潮流。直至60年代，當來自中國的移民放棄了返回社會主義祖國的念頭，而他們的後代又難以在香港以外找到家國之後，香港才開始建立一個穩定的華人社會。顯然，香港華人的身分認同啟端於60年代，並逐步地凝結起來。在過去十年的問卷調查中，認為自己對香港有歸屬感的被訪者，在全體被訪者中所佔的比例維持在頗高的水平。這方面的百分率在1985年^②、1988年、1990年、1991年、1992年、1994年及1995年的調查中分別為79.5、67.1、63.3、55.1、66.0、77.0及60.6。

對於在香港回歸中國之前香港人身分認同的形成，有幾項因素特別重要。首先而又是最重要的是這樣的一個事實：自從1949年以來，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權在香港與內地之間設置了一重障礙，使兩地人民不能在兩地之間自由進出。以此之故，香港華人便被隔離在中國之外而不受到內地翻天覆地的社會與文化變遷所衝擊。此外，在整個香港歷史中，香港的發展道路與中國的發展路向差異極大：香港實行放任的資本主義制度，而中國則大體上走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道路。1949年以後，兩地在發展經驗方面的巨大差異，對香港華人身分認同的形成有着關鍵性的意義。第三，中國在1949年後是一個內向的及對外封閉的社會，但香港卻迅速地發展為一個世界經濟體系中的活躍份子，並且經歷了相當程度的西化。第四，殖民政權所實行的有限職能政府 (limited

government)，及其對法治與人權的注重，都是在中國歷史中罕見的。相反，在傳統中國，社會由國家所支配，而個人則受制於群體。第五，有相當部分香港華人移居香港的目的，在於逃避政治迫害與動亂，又或者是尋找經濟上的發展機會。因此之故，香港內部有着一股強烈反對中國社會主義政權的情緒，這股情緒自然成為香港華人身分認同的一個核心部分。第六，香港與內地在發展程度與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距，使香港華人產生了一種優越感；有不少香港華人明顯地以鄙視的態度對待內地同胞。最後，香港華人普遍使用廣東方言，並逐漸以此為基礎建立了一種獨特的普及文化，這種特殊地方文化在塑造香港華人的身分認同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雖然香港與內地分隔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但由於香港華人在種族上乃華人，並且在內地有家庭、親戚、朋友及生意上的連繫，因此香港華人實際上不可能與中國的發展完全隔絕。儘管香港華人與內地華人在1997年之前並沒有共同的政治命運，但他們之間仍然有着濃厚的手足之情。對不少香港華人來說，殖民管治雖然是可接受的德政，但內心始終感到羞恥，有些時候甚至怒火中燒。種族歧視雖然愈來愈以含蓄或隱蔽的方式出現，畢竟它仍然是殖民管治的內在特徵，這便不可避免地使香港華人不時感到他們都是華人這個共同點。毫無疑問，共產主義令香港華人反感，不過，中國共產黨人畢竟使中國擺脫了外國人的羈絆，並且把中國建設為一個世界強國等事實，卻又在他們心中留下了深刻但又是矛盾的印象。不過，由於香港始終是不少人的庇護所，所以在塑造香港華人的身分認同過程中，無論是中國民族主義或者是反殖民主義，都沒有成為強大的力量。雖然有小部分香港華人擁護大陸的社會主義政權或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然而大部分人卻對政治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人們對中國國內政治的厭惡，才是形成香港華人的身分認同的最重要因素。

在1985年以來進行的一系列問卷調查中，我們詢問被訪者：在考慮到自己的身分時，他們認為自己主要是「香港人」、「中國人」、「兩者都是」或是「兩者都不是」。調查結果臚列在表1。

表1 香港人的身分認同* (表內數字為百分率)

	「香港人」	「中國人」	兩者都是	兩者都不是	不知道／ 無答案
1985 ⁺	59.5	36.2	—	—	4.3
1988	63.6	28.8	—	2.0	5.6
1990	57.2	26.4	12.1	1.0	3.4
1991	56.6	25.4	14.2	1.2	2.4
1992	49.3	27.0	21.1	0.7	1.9
1993	53.3	32.7	10.1	1.6	2.4
1994	56.5	24.2	16.0	0.5	2.8
1995	50.2	30.9	15.4	1.2	2.2

* 表內數字顯示認同「香港人」或「中國人」為其主要身分的被訪者的百分率。

⁺ 在訪問中，給予被訪者的答案並不包括「兩者都不是」及「兩者都」。

種族歧視雖然愈來愈以含蓄或隱蔽的方式出現，香港華人卻仍不時感到他們都是華人。不過，由於香港是不少人的庇護所，所以在塑造香港華人的身分認同過程中，無論是中國民族主義或者是反殖民主義，都沒有成為強大的力量。

從表中可見，香港華人心中的主要而又最具意義的身分顯然為「香港人」和「中國人」。絕大部分的被訪者毫無困難地選擇了「香港人」或「中國人」為自己的主要身分。明顯地，較多被訪者選擇「香港人」的身分。就這兩種身分認同的相對重要性而言，在過去十年中的情況是：選擇「香港人」身分及選擇「中國人」身分的被訪者的相對比例並不穩定。這個情況表明：香港華人的身分選擇，是受到在香港與中國發生的事情所影響的。此外，對於在1997年後那種身分會更為香港華人所認同，過去十年的數字卻沒法提供明顯的趨勢。另外一個頗堪玩味的發現是：數字當中似乎蘊藏着一個長期但緩慢的趨勢，顯示同時認同兩種身分的人的比例在上升。我們有理由相信，在香港回歸中國後，這個趨勢會進一步強化。

從調查發現中可見，在社會與個人特徵方面，認同自己為「香港人」的人與認同自己為「中國人」的人有着明顯的差異。首先，女性比男性更多地認同自己為「香港人」。在1985年、1988年、1992年、1993年及1995年的調查中，認同為「香港人」的女性與男性的被訪者的比例分別為67.3%與58.8%、73.5%與61.4%、55.9%與43.8%、53.9%與46.1%、及58.8%與44.4%。女性較傾向認同為「香港人」的主要原因，顯然是由於她們較少受到殖民統治所困擾、對中國較多持負面態度及對中國所取得的成就較少欣賞。

教育水平較高的人也較多地選擇「香港人」身分。這個現象在1985年、1990年及1992年的調查中都被發現。由於教育水平與收入有密切關係，因此自然地在1985年、1990年及1995年的調查中，收入較高的被訪者也較多傾向認同自己為香港人。

同樣地，在香港出生的人也較多地認同「香港人」的身分。這個現象可在1988年、1990年、1992年、1993年、1994年及1995年的調查中得見。年紀較大的人較大機會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出生，並且曾經接受過中國式的教育或社教化影響，他們自然會較年齡較輕者傾向於認同中國。這點也可在1985年、1988年、1990年及1991年的調查中得見。

如果從「香港人」及「中國人」兩種身分的認同者的社會及個人特徵的差異中作出判斷的話，我們可以這樣設想：如果香港在1997年後繼續由英國管治，那麼在過去十年中那些認同「香港人」身分的香港華人，在人口中的比例應該穩步上升，這是因為教育的普及化及在香港出生的人所佔人口比例增加之故。不過，正如前述，這個現象並沒有出現。這顯然與香港行將回歸中國這一事實，以及香港與中國兩地之間的接觸往還急遽增加有關。

與「中國人」比較，「香港人」對香港應有較強的認同感、對其所處身的社會應有較濃烈的社會歸屬感。不過，有關的資料卻並不確鑿地支持這個看法。

「香港人」較「中國人」不單不具有對香港較強的歸屬感，而且他們更有較明顯離開香港的意向。在1985年的調查中，與「中國人」比較(40.9%)，「香港人」更多表示有意移民外地(52%)。所以，擁有「香港人」身分認同並不表示對香港有強烈的歸屬感，而且它也不是一個壓抑移民意欲的有力因素。這個使人困惑的現象，在往後的調查中亦被發現。在1988年、1990年及1995年的調查中，分

在1985年的調查中，與「中國人」比較，「香港人」更多表示有意移民外地。所以，擁有「香港人」身分認同並不表示對香港有強烈的歸屬感，而且它也不是一個壓抑移民意欲的有力因素。這個使人困惑的現象，在往後的調查中亦被發現。

別有23.3%、25.1%及10.9%的「香港人」表示他們已經有了移民外地的計劃，與「中國人」相關的數字則為14.5%、13.3%及6.6%，這組數字全部都低於前組數字。同樣地，在1992年的調查中，當被問及他們的移民計劃時，38.5%的「香港人」表示他們一定會留在香港、14%表示「可以留下來便留下來、留不下來時才離開」、14.6%表示能夠離開的話便離開、1.7%表示一定會離開，而10.6%則表示尚未決定會否移民。與「中國人」相關的數字則分別為48.1%、11.1%、8.6%、0%及3.7%。

同樣地，較大比例的「香港人」（1988年：11.8%、1990年：14.8%、1992年：3.7%及1995年：3%）表示會在1997年前移民到其他地方（與「中國人」相關的數字分別為9.4%、9.2%、1.8%及1%）。此外，在1992年的調查中，我們發現有較大比例的「香港人」（20.7%）表示有信心能夠到外地移民，而有此信心的「中國人」則只有16.6%。而在那些表示有能力移民的人當中，有21.7%的「香港人」已經取得了外國護照或外國居留權，而這在「中國人」中的比例則較低（19.2%）。此外，在那些認為自己沒有能力移民的人當中，「香港人」中有計劃去獲得外國護照或外國居留權者的比例（9.5%）仍然高於有此計劃的「中國人」（2.6%）。

事實上，與「中國人」比較，「香港人」較多已經取得了外國護照或外國居留權。在1988年、1990年、1991年及1993年，分別有3.2%、4.1%、3.6%及19.7%的「香港人」承認已經取得了外國護照或外國居留權，而與「中國人」有關的數字則分別為2.7%、2%、1%及11.3%。1993年的有關數字突然上升，是由於過去幾年大量香港移民回流所致。他們顯然是在購買了「政治保險」之後銳意回港尋找發展機會。

何以「香港人」相對於「中國人」而言，並沒有較強烈的社會認同意識呢？原因肯定是十分複雜的。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香港人」較「中國人」更信任香港居民。在1991年的調查中，69.4%的「香港人」表示他們信任或十分信任香港居民，而持此態度的「中國人」則為64.2%。與此同時，較諸「中國人」（62.2%），更大部分的「香港人」（72.8%）相信香港居民愈來愈多使用不正當的手段去爭取自己的利益。由此以觀，「香港人」對香港居民的信任，明顯地由於對他們的道德操守有所懷疑而淡化。根據過往的研究，在香港華人的身分認同中明顯缺乏的，是對香港社會的濃烈感情依託。研究發現，香港華人對社會持實用主義態度，他們視社會為謀取生存手段或發達致富之地。換言之，人們對香港的歸屬感，並不表示一種社群的團結性或者是他們對某地域的集體輸誠。香港華人可能只是依戀一些流動的及無形的東西：一種生活方式或一種超越地理疆界的價值觀。惟其如此，我們便無須過份重視在1994年調查中的一項發現：有為數多達72.7%的「香港人」（及69.1%的「中國人」）表示他們覺得自己有責任為香港做些事，這是因為大體而言這種感覺並沒有轉化為實際行為。

進一步而言，「香港人」其實比「中國人」更受香港問題困擾。在1993年的調查中，憂慮九七問題的「香港人」（17.7%）較「中國人」（11.7%）多。在1988年及1991年，憂慮香港在1997年前出現政治不穩定的「香港人」（58.2%及47.2%）較「中國人」（35.8%及29.4%）多。1994年的調查發現，較大比例的「香港人」

研究發現，香港華人對社會持實用主義態度，他們視社會為謀取生存手段或發達致富之地。換言之，人們對香港的歸屬感，並不表示一種社群的團結性或者是他們對某地域的集體輸誠。香港華人可能只是依戀一種生活方式或一種超越地理疆界的價值觀。

「香港人」及「中國人」共同擁有很多典型的華人價值觀。1993年的調查發現顯示，香港雖然長期以來經歷了西化過程，但香港華人都是傳統價值觀念的堅定捍衛者，而這些觀念宣揚對國家的效忠，並同時把個人及少數民族置於次要的地位。

(50.5%) (「中國人」的比例則為40%) 憂慮在「未來幾年」出現政治動盪。在1991年，「香港人」(68.9%) 則較「中國人」(48.1%) 更擔憂1997年前香港會出現社會不穩定。

儘管「香港人」及「中國人」都預期香港的生活質素會下降，但前者卻比後者更難適應這些變化。因此，正如1991年的調查發現顯示，雖然有58%的「香港人」表示他們能夠容忍九七後個人自由稍為下降，但能夠這樣做的「中國人」卻多達76.9%。另外，雖然只有17.9%的「香港人」表示能夠容忍九七後個人自由大為減少，但卻仍有較大部分(34.5%)的「中國人」聲稱能夠這樣做。同樣地，只有15.2%的「香港人」能夠接受九七後個人收入大幅度下降，但卻有較大部分(29.5%)的「中國人」可以這樣做。

正因為「香港人」心中有着各種各樣的憂慮，以及他們對九七後香港的可能變遷容忍能力較弱，再加上他們擁有較多有助於他們移民他國的資源，這便造成了「香港人」有較明顯傾向在外地重建家園的原因。

身分認同及華人性

儘管身分認同有異，但由於「香港人」及「中國人」在民族及文化上都是華人，所以許多普通的「華人性」元素都可以在兩者之中找到。從民族與文化上的意義來說，香港華人對中華民族具有強烈的認同感。即使那些認同香港的人也以中華民族及文化為榮。在1985年的調查中，60.8%的被訪者同意或十分同意中國文化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文化，而78.6%的人則以能夠做一個中國人為榮。

事實上，「香港人」及「中國人」共同擁有很多典型的華人價值觀。例如，1994年的調查發現，絕大部分的「香港人」(92.9%) 和「中國人」(94.1%) 都同意在今天的香港，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念(例如忠孝仁義) 仍然應該受尊重。如出一轍地，絕大多數的「香港人」(96.3%) 及「中國人」(95%) 表示香港市民應該尊重那些孝順父母的人。同樣地，與傳統中國的華人一樣，相對多數的「香港人」(38.2%) 及「中國人」(37.7%) 對有錢人不表尊敬。然而，86.1%的「香港人」及89.5%的「中國人」對勤勞工作的人有一份誠摯的尊重，但那些「一世好命」的人卻只得到13.2%的「香港人」及18.9%的「中國人」的尊敬。此外，與傳統文化對賣藝人的歧視相若，只有11.8%的「香港人」及19%的「中國人」對歌星及影視明星表示尊敬。

在傳統中國，相對於個人，國家及群體被賦予遠為崇高的地位與重要性。1993年的調查發現顯示，香港雖然長期以來經歷了西化過程及有限職能政治管理，但香港華人對個人與國家在抽象層面上所應建立的關係卻顯然未有發生深刻的變化，這個現象可在表2中概見。

在表中所臚列的一半說法中，「香港人」和「中國人」的觀點在統計上沒有顯著的差異。他們都同意把個人置於國家之下，並且都撻伐地方主義。不過，由

表2 對國家的態度及身分認同 (1993)* (表內數字為百分率)

	「香港人」	「中國人」	χ^2
(1) 先有個人才有國家，個人是國家的根本。	72.8	66.4	不顯著
(2) 不要問國家為自己做了些甚麼，要問自己為國家做了些甚麼。	68.6	79.5	$p = .02$
(3) 為了謀求個人的福利才需要組成國家，如果不講個人的話，國家就沒有存在的必要。	33.8	37.7	不顯著
(4) 如果地方政府每樣事情都強調有權自主、自治，國家的事情就沒有辦法辦得好。	51.7	56.3	不顯著
(5) 收回中國歷史上失去了的領土是所有中國人的神聖使命。	68.0	82.2	$p = .00$
(6) 社會是一個大家庭，即使是少數民族，亦不可以要求脫離。	76.8	82.3	$p = .02$

* 表內數字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有關說法的被訪者的百分率。

不顯著：在0.05顯著度上不顯著。

於他們又同時認為個人是國家的根本，所以在個人與國家的關係方面，「香港人」與「中國人」在觀念上有不一致之處。即使就那些「香港人」與「中國人」之間存在着統計上顯著差異的說法而言，實際情況依然是：他們都是傳統價值觀念的堅定捍衛者，而這些觀念宣揚對國家的效忠，並同時把個人及少數民族置於次要的地位。事實上，在「香港人」和「中國人」的身分認同中，是蘊含着初生的民族意識的。

因此，無論是從民族意義或歷史文化意義而言，「華人性」在「香港人」和「中國人」的身分認同中都是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也是他們用以界定自己為華人或中國人的根本。由於這些共通部分的存在，「香港人」與「中國人」這兩種身分認同的差距便大為縮小。事實上，這兩種身分認同非但不是完全分割或相互排拒的東西，反而彼此之間有相當程度的重疊。這兩個身分認同的相互滲透性，在調查發現中也可概見。在1992年的調查中，我們發現人們選擇何種身分認同，與他們是否以「香港人」或「中國人」為榮有統計上的顯著相關。不過，更重要的，卻是「香港人」及「中國人」都以自己同時為香港人及中國人為榮。在「香港人」當中，分別有83.2%及63.8%的人以身為香港人及中國人為榮。同樣地，持此態度的「中國人」則分別為66%及79.7%。

同者，雖然「香港人」及「中國人」在身分認同上有差異，但他們卻對與香港及中國有關的同一事物感到驕傲——主要是關於經濟發展及其相連的東西。這個情況可在表3中得到反映。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對於社會主義中國在政治上的成就而言，「香港人」及「中國人」的光榮感卻大為遜色。這些現象表明，如果是涉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國的社會主義政府的話，香港華人的感情是複雜的，甚至是負面的。

「香港人」及「中國人」對與香港及中國關於經濟發展及其相連的東西感到驕傲。不過，對於社會主義中國在政治上的成就或涉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話，「香港人」及「中國人」的光榮感卻大為遜色，甚至是負面的。

表3 對香港及中國引以為榮的事及身分認同 (1992a) (表內數字為百分率)

	「香港人」	「中國人」	χ^2
香 港			
(1) 香港人夠機靈，反應快，適應能力強。	90.7	81.3	不顯著
(2) 香港甚麼都吃得到，甚麼都可玩到，生活方便。	87.1	84.5	不顯著
(3) 香港是最自由的中國人社會。	91.5	88.5	不顯著
(4) 香港經濟發展驚人，是亞洲四小龍之一。	93.6	89.3	不顯著
中 國			
(1) 中國人十分勤力，又刻苦，又有能力。	88.3	84.3	$p = .00$
(2) 中國山河壯麗，名勝古蹟極多。	85.3	87.3	不顯著
(3) 今天中國已經是超級大國，中國人可以吐氣揚眉。	55.3	59.8	不顯著
(4) 中國現代化之後，經濟發展迅速，特別是珠江三角洲，極有可能成為亞洲第五條小龍。	72.8	82.7	不顯著

* 表內數字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有關說法的被訪者的百分率。

不顯著：在0.05顯著度上不顯著。

對中國及中國政府的態度

「香港人」及「中國人」雖然在民族及文化意義上的差別有限，但他們在對待真實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的中國同胞及中國政府的態度上，彼此之間有着顯著的分歧。不過，話雖如此，「香港人」與「中國人」在態度上仍然是基本上相同的。所以，他們之間的差異只是程度上，而非本質上的。

在1992年的調查中，我們向被訪者發問十二條問題，目標在於探測他們對中國及香港的感情。調查結果在表4中列出。

就對香港的感情而言，重要的發現是：「香港人」與「中國人」在這方面只有很小的分別。如果香港和中國之間有衝突的話，他們都會肯定的站在香港一邊。他們都以香港所取得的成就為榮，並且對中國都流露出一份優越感。地方主義情緒在他們當中也明顯可見。在涉及香港與大陸關係的事情上，他們傾向以照顧香港利益為首務。

「香港人」與「中國人」的顯著分別，在於他們對現實中國的態度上。不過，最值得重視的是，他們基本上都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缺乏好感。這個對現實中國的負面印象可謂由來已久。在1985年的研究中，我們發現：縱使香港華人在民族與文化層面上認同中國，不過他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大陸的同胞的認同感卻甚為薄弱。只有少於一半（42.5%）的被訪者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過去數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驕傲。只有稍多於一半（52.5%）的人表示對大陸的中國人有親切感。

從表4中的數字可見，「香港人」比「中國人」更多偏重香港本身的利益，尤其是涉及香港的重大利益的時候，雖然後者的地方主義取向其實也是頗為明顯

在1992年的調查中，我們有重要的發現：就對香港的感情而言，「香港人」與「中國人」的分別不大。如果香港和中國之間有衝突的話，他們都會肯定的站在香港一邊。地方主義情緒在他們當中也明顯可見。涉及香港與大陸關係的事情上，他們傾向以照顧香港利益為首務。

表4 對中國與香港的態度及身分認同 (1992a)* (表內數字為百分率)

	「香港人」	「中國人」	χ^2
中 國			
(1) 為了國家富強，個人利益有時不應過份計較。	48.0	65.7	不顯著
(2) 香港人應該以中國的利益為重，不應該只講求香港利益。	18.8	33.1	$p = .00$
(3) 身為中國人，一定贊成香港的學生在上早堂之前要唱國歌。	15.1	27.6	$p = .00$
(4) 香港應該用普通話作第一官方語言。	33.5	52.4	$p = .00$
(5) 香港如果有財政盈餘，應該撥一部分給中國作發展之用。	38.4	56.5	$p = .00$
(6) 如果有利於中國的行政管治，香港可以放棄它的特別行政區地位。	16.3	23.8	$p = .01$
(7) 只要中國有需要，香港甚麼都可以犧牲。	6.2	20.8	$p = .00$
香 港			
(1) 身為香港人，當香港代表隊對中國國家隊的時候，應該支持香港隊。	75.7	62.0	$p = .02$
(2) 香港的電影有時會諷刺內地，即使這樣，中國都不可以用任何理由不讓它們在香港上映。	79.8	68.7	不顯著
(3) 香港政府如果要向外借錢改善香港的基本設施，中國應該大力支持。	79.2	73.9	不顯著
(4) 為了香港的進一步發展，中國應該把深圳劃歸香港。	29.4	30.2	不顯著
(5) 香港既然那麼成功，整個中國都應該香港化。	56.0	44.9	不顯著

「香港人」與「中國人」縱使在民族與文化層面上認同中國，不過他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大陸的同胞的認同感卻甚為薄弱。由此觀之，從政治角度而言，「香港人」與「中國人」在是否信任中國政府的問題上其實沒有實質差異。

* 表內數字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有關說法的被訪者的百分率。
不顯著：在0.05顯著度上不顯著。

的。不過，如果香港有多餘金錢的話，「中國人」卻有一個溫和的意願去為中國提供協助。「中國人」比諸「香港人」更願意以普通話取代廣東話作為香港的官方語言。另外，雖然他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缺乏好感，但「香港人」及「中國人」——特別是後者——卻仍然表示頗為同意以下說法：「為了國家富強，個人利益有時都不應過份計較。」當然，這種態度究竟在行為上有何意義，現在無法衡量。

就對中國政府的信任程度而言，「香港人」與「中國人」有着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不過他們基本上都不大信任中國政府。表示信任中國政府的「香港人」的比例，在1988年、1990年、1991年、1992年、1993年^③、1994年及1995年分別為17.8%、5.6%、7.4%、11.1%、20.8%、8.8%及10.2%，而與「中國人」相關的數字則分別為36.1%、18.7%、28.7%、40.9%、50.2%、21.9%及20.6%。由此觀之，從政治角度而言，「香港人」與「中國人」在是否信任中國政府的問題上其實沒有實質差異。

與「香港人」較傾向不信任中國政府相一致的，是他們對香港的前景也較缺乏信心。在1988年，「香港人」當中對香港前途有信心的比例(63.4%)較「中國人」(85.1%)為低。在1994年，對香港前途有信心的「香港人」的比例(37.1%)有所下降，而「中國人」(56%)亦如是。然而，「中國人」比「香港人」始終對香港前途較具信心。

「香港人」較傾向認為中國與香港存在着利益衝突。在1988年，有多達71.7%的香港人承認衝突的存在，而只有較小部分(56.6%)的「中國人」作如是觀。結果便是：在1991年，「香港人」(13.4%)較諸「中國人」(35.4%)更少相信中國政府會照顧香港人的利益。

一如所料，「香港人」對中國政府所持的較負面感情也投射到他們對香港及中國的前景的評估之上。在1994年，表示對中國前景樂觀的「香港人」的比例(38.2%)較「中國人」(52.7%)為低。大多數的「香港人」(58.9%)對九七後香港的法律制度缺乏信心，而有此看法的「中國人」則少於一半(45.1%)。「香港人」(34.3%)也較「中國人」(48.7%)少對《基本法》有信心。認為中國有能力搞好香港的「香港人」(39.1%)也較「中國人」(53.1%)為少。1995年的調查也發現，相對於「中國人」(39.2%)，較低比例的「香港人」(22.4%)認為中國政府在九七年後會真正讓香港人自己管理香港。「香港人」(65.8%)較諸「中國人」(59.6%)更傾向認為將來的特區政府會主要照顧中國的利益。同樣地，「香港人」(16%)比「中國人」(41%)較少認為將來特區政府會把香港管理得比現在的香港政府更好。此外，「香港人」(9.4%)也比「中國人」(18.3%)較傾向不信任將來領導特區政府的政治領袖。然而，「香港人」和「中國人」在這些方面的分別主要是程度上的，而非本質性的。事實上，他們的態度基本上是相似的。

由於他們對中國政府的不信任，「香港人」也較「中國人」傾向以抗爭手段對付中國政府來保障自身的利益及發泄不滿(8.9%對7%)。當然，由於中國與香港強弱懸殊之故，香港華人其實是十分害怕與中國政府對抗。同樣地，在1995年的調查中，多於一半的「香港人」(58%)聲稱他們會支持那些不為中國政府所容的政治領袖，而表示願意這樣做的「中國人」則少於三分之一(30.9%)。更能顯示「香港人」對中國政府厭惡之情的是1988年的一項發現：稍多於一半的「香港人」(53.5%)支持香港獨立，而在「中國人」中的支持者則只有30%。「香港人」的這種立場，與前述他們願意把國家利益置於地方利益之上的態度大相逕庭。

「香港人」對中國政府較程度的不信任，是與他們較程度地信任英國有關。事實上，「香港人」比「中國人」對殖民管治較具好感。在1994年的調查中，較大部分的「香港人」(55.1%)支持在九七後保留香港為英國殖民地，而持此意見的「中國人」則只有28.8%。同時，稍低於一半的「香港人」(43.4%)認為華人與英國人在香港享有同等的地位，但「中國人」中卻只有33.6%承認種族平等的存在。雖然「香港人」(57.4%)及「中國人」(68.2%)都認為英國在處理香港事務時以英國利益為先，但「中國人」顯然更感不滿。

正因為「香港人」對英國政府及香港政府有更大的信任，他們較傾向要求英國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便不足為奇了。由於「香港人」較為憂慮中國政府在香港回歸前干預香港事務，他們也便特別關心香港政府在英國最後管治的日子裏的

「香港人」對中國政府較程度的不信任，是與他們較程度地信任英國有關。事實上，「香港人」比「中國人」對殖民管治較具好感。在1994年的調查中，較大部分的「香港人」(55.1%)支持在九七後保留香港為英國殖民地，而持此意見的「中國人」則只有28.8%。

自主性問題。1991年的調查中發現，雖然「香港人」承認在過渡期內中英合作的重要性，但他們(54.8%)與「中國人」(64.8%)相比，仍然較少認為在過渡期內，英國在作出重大決定前應該尋求中國政府的同意。同樣地，在1992年，「香港人」(75.2%)較「中國人」(59%)傾向認為香港政府應該堅守那些有利於香港的政策，即使中國政府反對亦在所不惜。

總的來說，「香港人」與「中國人」的最大分別，在於他們對社會主義中國及中國政府的態度。不過，既然他們的態度大體相似，這些分別也非嚴重到在不同身分認同的香港華人之間引發嚴重衝突。

「六四事件」與身分認同

1989年春在北京發生的「六四事件」中，中國政府使用軍隊驅散示威學生，這在香港華人社會中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和情緒震撼。香港華人採用了多種方式來表達他們對示威學生的支持及對中國政府的不滿，其中最矚目的是有為數約一百萬的香港華人自發地上街遊行。這類大規模的香港華人的政治積極性表現雖然為時甚短，但它在香港歷史上卻是絕無僅有的。而這也是海外中國人對中國政府採取最具抗爭性的一次群眾行動。香港華人對「六四事件」的強烈反應，毫無疑問地與香港即將回歸中國這一事實及其所引發的憂慮、徬徨與抑鬱有關；這些反應反映了香港華人對中國的明顯認同。「六四事件」也為「香港人」的身分認同的集中與清晰表現提供了一個黃金機會。反過來說，香港華人在經歷這個使人痛心的事件中所取得的共同經驗，也進一步強化了「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感。

「香港人」在「六四事件」所引發的群眾行動中，比「中國人」擔當了一個更突出的角色。不過，當「六四事件」的激情沉寂之後，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中國人」反而較「香港人」更能以務實態度對待「六四事件」。



「香港人」與「中國人」都有溫和的民主訴求，不過這個訴求卻滲透着功利性的態度。香港華人只期望民主政制能夠為自己帶來一些具體的政治成果；而不重視民主的正面意義——即人民參與政治的權利。香港華人的民主觀，明顯地蘊含着權威主義的元素。

「香港人」在「六四事件」所引發的群眾行動中，比「中國人」擔當了一個更突出的角色。在1992a年及1993年的調查中，我們詢問被訪者有沒有參與1989年「六四事件」有關的遊行和集會活動。在1992a年，有較大比例的「香港人」(25.9%)（「中國人」的比例為18.8%）承認他們曾經參與那些活動。在1993年的相關數字則分別為26.6%及18.2%。兩項調查的數字十分接近。此外，1992a年的調查發現，「香港人」較「中國人」(63%對59.5%)更多留意報章上有關「六四事件」的報導、更多留意電視與電台對該事件的廣播(68.6%對68.3%)、及更多(32.8%對29.3%)與朋友及親戚討論該事件(32.8%對29.3%)。不過，在1989年以後，「香港人」對「六四事件」的熱情明顯比「中國人」冷卻得快。在1992a年的調查中，分別只有5.6%、3%及1%的「香港人」表示他們曾經參與紀念「六四事件」一周年、兩周年及三周年的遊行與集合活動，而與「中國人」有關的數字則分別為7.3%、3.6%及2.4%。這些發現顯示，隨着該事件所激發的巨大憤慨感的消逝，只有「中國人」對中國較程度的情感連繫，才可以發揮使人們堅持參與的作用。

雖然「香港人」及「中國人」都以反對社會主義政權的角度來理解「六四事件」，不過「中國人」依然比「香港人」較少同情北京學生。1992a年的調查發現，10.3%的「香港人」把「六四事件」理解為北京居民及學生所發起的暴亂，而同意此觀點的「中國人」則有13.1%。21.6%的「香港人」認為「六四事件」是一小撮人在搞事，但卻有30.5%的「中國人」這樣想。「香港人」當中有16.7%同意「六四事件」只是一件意外的事，暗示無人須要對此承擔責任，但卻有19.3%的「中國人」持此看法。「香港人」中有多達86.1%認為「六四事件」是一個中國政府處理失當的事件，但這樣認為的「中國人」則比例較小(73.1%)。同樣地，絕大多數「香港人」認為「六四事件」乃血腥鎮壓，但「中國人」中持此意見者則比例較小(76.6%)。

不過，當「六四事件」所引發的激情沉寂之後，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中國人」反而較「香港人」更能以務實態度對待「六四事件」。他們顯然以香港的利益為出發點，特別考慮到香港與中國的關係。例如，在1992a年的調查中，有較小部分(28.9%)的「香港人」（「中國人」的比例則為35%）同意「為了香港的安定繁榮，我們應該忘記六四事件」。與「中國人」(35.2%)相比，「香港人」(29%)較少同意「為了中港的良好關係，我們應該忘記六四事件」。如出一轍地，有較大部分的「香港人」(56.1%)（「中國人」的比例為45.4%）表示「我們應該繼續紀念六四的活動，直至中國政府釋放所有民運人士為止」。從不同身分認同的人對香港市民支援香港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一個在「六四事件」期間成立的組織）的態度中，亦可看到同樣的差異。認為「支聯會」應該解散的「香港人」佔21.7%，但卻有28.9%的「中國人」持此態度。

香港華人——特別是那些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人——深為「六四事件」所震撼。他們充分感到彼此有着共同的政治命運，而這個政治命運又被看成是不明朗及悲哀的。在中國大陸所發生的突然變故，使他們不單對中國政府徹底失望，也使他們對中國政府對香港的承諾失去信心。香港華人，特別是「香港人」，在情感上及政治熱情方面的突然流露，可以理解為一種香港認同感的生動

反映。即使那些認同為「中國人」的人，也在相當程度上與「香港人」有共通之處。1989年因此可以被視為香港華人的地方意識形成過程中的里程碑。

對民主改革的態度及身分認同

如果「香港人」對中華民族、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國政府的態度與「中國人」的分別基本上只是程度上的，而非本質性的差異的話，則他們在香港民主改革問題上的態度分歧，亦無二樣。換句話說，「香港人」與「中國人」在政治上的差異並不嚴重。因此，在這方面而言，香港華人在身分認同方面的不同，並沒有造成「香港人」與「中國人」之間的矛盾。

「香港人」與「中國人」兩者都有溫和的民主訴求，不過這個訴求卻滲透着矛盾的感情。這種民主觀代表着一種功利性與片面性的態度。它之所以是功利性的，是因為香港華人期望民主政制能夠為自己帶來一些具體的政治成果；它之所以是片面性的，是因為人們從負面角度去理解民主：民主政制的功用在於保障自己的權利與利益，使得它們免於受到中國政府及香港的當權者的侵犯。至於民主的正面意義——即人民參與政治的權利——則明顯不那麼受到重視。香港華人的民主觀，明顯地蘊含着權威主義的元素。他們強調政治穩定及強勢政府的重要性。在1992年的調查中，相當大部分的「香港人」(83.9%)及「中國人」同意香港需要一個有力的政府來維持政治穩定。同樣地，82.5%的「香港人」和77.7%的「中國人」認為香港需要一個強勢政府去保持經濟繁榮。1993年的調查也有類似發現：大多數的「香港人」(65.6%)及「中國人」(62.6%)同意「限制政府的權力並非好事，因為這樣做會影響政府的效率」。不過，雖然人們強調強勢政府的重要性，但在某程度上他們也意識到那個政府也應該受到監督與約束，以避免濫權現象的出現。這些考慮在1992年的調查中多處可見。少於一半的「香港人」(37.9%)及「中國人」(41.6%)同意以下說法：「要解決香港當前面對的問題，香港政府必須強而有力，它是否民主反而是次要。」更小部分的「香港人」(28.1%)及「中國人」(36.7%)同意以下觀點：「要解決香港當前面對的問題，最重要的是香港政府行政有效率，民意諮詢反而是次要。」在1993年的調查中，只有少數的「香港人」(26.5%)及「中國人」(36.5%)贊同這樣的一種論點：「只要有品行端正的政治領袖，我們就可以把所有的公共事務交給他們辦理，我們無須提出太多意見。」然而，1992年調查的一項發現顯示，當涉及他們較屬意一個夠效率但不夠民主的香港政府或一個夠民主但是不夠效率的香港政府時，「香港人」與「中國人」在態度上的分歧便明顯加大。少於一半的「香港人」(37.1%)表示願意接納一個較不民主但工作效率較高的政府，但卻有多於一半的「中國人」(57.1%)屬意這種政府。

雖然「香港人」與「中國人」有不少相似之處，但他們之間仍然存在着微妙的差異。大體而言，「香港人」儘管比「中國人」有較強的民主訴求，然而「中國人」卻對民主有較「浪漫的」或「理想化」的理解。「中國人」之所以對民主化的態度較淡薄，是因為他們對現行政治體制及香港政府的表現較滿意，因而比「香港人」

由於「香港人」較不信任中國政府，他們因此較傾向認為民主化是在九七後強化香港的自主權及防犯中國干預香港事務的手段。因此，1993年的調查發現，較大部分的「香港人」(74%)（「中國人」則有59.3%）不同意進一步民主化會危及香港的穩定。

儘管中國政府不斷重申中華民族的一體性，但以「一國兩制」方式來處理香港在脫離殖民管治後的前途，實際表示了中國政府打算用充裕的時間去完成香港與內地的整合。「一國兩制」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舒緩了任何在香港可能出現的「身分危機」。

有稍高的政治自滿感。例如，在1988年，有75%的「香港人」同意「雖然香港的政治制度並非完美，但是在香港的現實環境之下，它已經是最好的了」，但同意這個論點的「中國人」則有78.1%。此外，與「香港人」(40%)相比，較大部分的「中國人」認為香港政府的工作表現良好。

由於「香港人」較不信任中國政府，他們也因此較傾向認為民主化是在九七後強化香港的自主權及防犯中國干預香港事務的手段。例如，在1988年，比諸「中國人」(33.3%)，有稍大部分的「香港人」(35.2%)相信香港「有了直接選舉之後，就可以防止中國政府干預香港事務」。

除了實用性的考慮之外，「香港人」對民主的較高訴求，也與他們的政治面貌較為現代化有關。此點可以數項證據說明。1992年的調查發現，當被要求比較政治穩定與民主政府何者較重要時，比諸「中國人」(8%)，較大部分的「香港人」(16%)認為民主政府較重要。同樣地，當他們被問及經濟繁榮與民主政府何者較重要時，依然有較大比例的「香港人」(17.8%)（「中國人」有9.6%）認為民主政府較重要。

1993年的調查發現，「香港人」也較「中國人」傾向肯定政治平等的價值觀。與「中國人」(48.3%)比較，較大部分的「香港人」(55.8%)反對「教育程度高的人，對政治應該有更大的發言權」。較大部分的「香港人」(76.3%)（「中國人」有68.8%）反對「政府首長等如是大家庭的家長，一切大大小小的公共事務，都應該聽從他的決定。」「香港人」(16.7%)也較「中國人」(14.2%)傾向認為香港的民主化步伐太緩慢。較大部分的「香港人」(74%)（「中國人」則有59.3%）不同意進一步民主化會危及香港的穩定。同樣地，香港總督彭定康所推行的政制改革在「香港人」當中獲得較大的支持。1995年的調查發現，較大比例的「香港人」(45.1%)（「中國人」則有27.5%）認為彭定康政府所推行的政制改革對香港有利。

總 結

經過詳盡的論證後，我們便可以對文章前段所提出的問題作出一些解答。毫無疑問，「香港人」與「中國人」在政治與社會態度方面是有差異的。不過這些差異與香港華人與國內華人之間的差異比較，可謂微不足道。所以，香港華人社會內存在着的不同身分認同，應該不會構成重大的、有嚴重社會和政治含義的裂隙。事實上，「香港人」與「中國人」在態度上的有限分別，正好說明身分認同的形成，在香港只有很短的歷史，而且人們對自己選擇的身分亦只有低度的感情投入。

無論「香港人」的身分也好，或者是「中國人」的身分也好，都是建築於種族與文化基礎之上。它們似乎都不具有地域的認同，因為兩者都不涉及對香港或中國作為一塊土地的效忠。它們也不要求身分認同者對具體的政權輸誠。此外，兩種身分都不包含強烈的、狹隘的或原始的感情（例如地方主義或次民族主義）。因此，在香港並不存在那種在其他發展中社會中為國家建設造成障礙的狹隘主義與原始感情。

對於把香港在文化上及政治上融入中國母體之內所面對的各種困難，中國政府是充分了解的。儘管中國政府不斷重申中華民族的一體性，但以「一國兩制」方式來處理香港在脫離殖民管治後的前途，卻實際表示中國政府打算用充裕的時間去完成香港與內地的整合。《基本法》的序言說明了中國的對港政策：「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並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國家決定，在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不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第五條更特別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事實上，就最終香港與內地的整合而言，中國政府的考慮是極長遠的，而非短期性的。「一國兩制」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舒緩了任何在香港可能出現的「身分危機」。這個模式並不要求香港華人在態度上與行為上有所改變，當然他們之中仍然有部分人憂慮中國政府會強制他們作出改變。無論如何，直至目前為止，還未有任何迹象顯示香港華人在心理上受到「身分危機」的困擾。基本上，香港亦未有出現因身分問題而引發的集體行動（1989年春所出現的活動或許屬於這類）。另一方面，由於「一國兩制」的安排在香港與內地之間設置了一道屏障，這項安排實際上使到香港人的獨特身分更為強固及持久。

在社會主義中國之內保留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即使有「一國兩制」的安排，香港與內地也無可避免地會產生摩擦，尤其是由於「一國兩制」的目標並不在於分隔兩制，反而是在加強兩者的接觸，從而使香港更能為中國的現代化作出貢獻。香港華人對社會主義政權的不信任與恐懼，肯定仍然會對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產生不利的影響，特別是中國政府難以完全抗拒介入香港事務的誘惑。不過，雖然人們對中國的國家組織有疏離感，但他們對中華民族依然有濃厚的認同感。這種情況便解釋了為甚麼香港華人一方面在1989年對北京學生的政治要求有着強烈共鳴，但他們又同時對中國運動員在國際賽事中所取得的成就引以為榮。因此，「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並不衍生分離主義。事實上，對香港的認同及對中國的認同，代表着雙重及互相配合的身分認同。香港華人從來沒有提出政治獨立的要求。此外，即使香港華人對香港回歸中國心存憂慮，但他們卻從來不質疑中國對香港的主權。

1997年之後，有數項因素可能會強化香港華人對中國甚至對中國政府的認同。它們包括：香港在政治上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中國軍力的擴展及國際地位的提升、內地與香港日益密切的經濟連繫、中國的現代化、中國對香港發展的影響日深、民族意識的傳播及兩地之間愈趨緊密的社會文化交流。

現時我們難以準確預測香港華人在身分認同方面的發展。不過，鑒於以往的情況，「香港人」與「中國人」的身分認同將來有可能融合在一起，並產生一種新的香港華人身分認同。這個新的身分認同仍會有別於內地華人的身分認同。在他們帶地方色彩的身分認同之上，香港華人會逐步地接納一個更大的華人身分認同，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有可能成為認同對象。另外一個可能的發展是：雖然彼此之間存在着矛盾，對香港的認同及對中國的認同會出現愈來愈相互配

即使香港華人對香港回歸中國心存憂慮，但他們卻從來不質疑中國對香港的主權，因而也沒有提出政治獨立的要求。鑒於以往的情況，「香港人」與「中國人」的身分認同將來有可能融合在一起，香港華人會逐步地接納一個更大的華人身分認同，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可能成為認同的對象。

合的情況。這是因為，對香港的認同不單不要求否定對中國的認同，反而使它更為強化。

註釋

① 在所有問卷調查中，被訪者的年齡都在18歲以上。調查中使用的抽樣範疇 (sampling frame)，由住戶住址組成。除了1985年的調查外，其他調查都是全港性的調查。我們通過隨機抽樣程序從住戶的樣本中抽選被訪者，以下是這些調查的簡述：

(1) 1985年的調查在觀塘(一個多元化的、工業區與住宅區混合的社區)進行，時間為1985年的夏秋兩季。調查所使用的抽樣範疇，是香港政府統計處在1981年全港人口普查中所制訂的全港性住戶名單中抽取百分之二出來的樣本。這個系統性樣本的住戶數目為1,687個。我們共成功進行了792個訪問，回應率為46.9%。

(2) 1988年的調查在該年的夏季進行。訪問樣本是通過一個多階段性的抽樣設計方式而取得，而抽樣範疇則來自一個具有3,488個住戶住址的、儲存在香港政府統計處的居住單位電腦檔案內的樣本。調查最後所用樣本共有649個住戶。調查成功訪問了396人，回應率為61%。

(3) 1990年的調查在該年的夏季至翌年的冬季進行。樣本的住戶數目為613。共有390人成功接受了訪問，調查的回應率為63.6%。

(4) 1991年的調查在該年的夏季進行。樣本中住宅數目為718。調查共成功完成了401個訪問，回應率為55.8%。

(5) 1992年的調查樣本中有住戶數目1,568個。1992年的調查主要在該年的5月至9月之間進行，共成功訪問了868人，回應率為55.4%。

(6) 1992a調查所用樣本中的住戶數目為3,361。調查主要在1992年12月至1993年2月之間進行，共完成了1,993個訪問，回應率為54.9%。

(7) 1993年的調查中所用樣本有住戶1,633個。調查主要在1993年5月至7月間進行。共成功訪問了892人，回應率為54.6%。

(8) 1994年的調查所用樣本與1993年的相同。樣本中有住戶1,748個。調查主要在1994年5至7月間進行。共成功完成了997個訪問，回應率為57%。

(9) 1995年的調查所用樣本與1994年的相同。樣本中共有住戶663個。訪問工作在1995年夏天進行。共成功訪問了408人，回應率為61.5%。

② 在1985年的調查問卷中，我們採用了一個四點的量度尺(非常少、少、大、非常大)，但其他的調查則採用五點的量度尺(非常少、少、普通、大、非常大)。所以，如果1985年的調查是用五點量度尺的話，則1985年的有關數字應該較小。

③ 1993年調查問卷採用了四點量度尺(非常不信任、不信任、信任、非常信任)，而所有其他的調查則使用了五點量度尺(非常不信任、不信任、普通、信任、非常信任)。如果是用了五點量度尺的話，則1993年調查的有關數字應該較小。

這項研究獲得大學撥款委員會的研究資助局、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及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太平洋邊緣研究中心的資助，謹此表示謝忱。在進行問卷調查及數據分析方面，我得到尹寶珊女士、沈國祥先生、張賢彬先生及張淑文小姐的襄助，也順道在此一併致謝。

劉兆佳 現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暨社會學系系主任，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